



笑傲人生



笑傲人生

笑傲人生

龍門觀察

李白的人格与风格

傅绍良

笑傲人生



笑傲人生

傅紹良



1962年出生于湖南澧县，1987年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校文学研究所讲师。情迂阔而顽鲁，好冥思而寡获，几年来发表过《论中国古代梦幻文化中的主体意识》、《论李白的个性意识与悲剧心态》等十数篇论文，参加编写了几部大型辞书及《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龙门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姚奠中	
主	编	刘毓庆	
副	主	梁归智	董国炎
编	委	阎凤梧	(特邀)
		李健	牛贵琥
		姚力芸	董国炎
		梁归智	刘毓庆

责任编辑 李健
装帧设计 金星

总 序

沿着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双轨，我们启动机车，向龙门进发。

黄河东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龙门，神州之形胜；

龙门，中国文化之门；

龙门，开凿混沌的象征；

龙门，开放发展的印证！

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辉煌而又沉重，它的精魂在文学的形象中载沉载浮。传统文学不是苍白的幽灵，而是鲜活的生命，它在与现代人的交流、对话中获得永生。

作为民族感情的升华，作为民族精神的闪光，作为民族灵魂的运作，作为现实的文化背景，作为民族存在的根据，我们试图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底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以丛书的形式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时代呼声作出一种回应。如果根据周易的原理，将文学分为艺术及思想内容层，个性心理意识层，群体心理意识层，民族及人性心理意识层等四个不同层次，那么我们现在更着重于探索其深层的“动静”，沟通历史与现实，通过昨天的反思，认识今天的形象。审美说到底是一种生命存在和体验的方式，对民族审美体验的结晶物。

文学的重新品味和涵咏也就是民族生命的认用和更新。

龙门是神秘的，龙门是幽邃的，龙门是开敞的。我们将深

入，再走出，然后跳过！

我们曾经都是鱼，我们将成龙，还将在见首不见尾的腾挪变幻中向无际的天宇作永恒的追寻。

《龙门丛书》编委会

目 录

第一章	时代的宠儿与弃儿	(1)
1	科举时风下的人格独立	(2)
2	怀古情结与心理调适	(11)
3	大鹏三部曲	(23)
第二章	生命的忧患与超越	(33)
1	谪仙的政治梦	(34)
2	仙幻迷狂与社会理性	(42)
3	生命价值的失落与反思	(52)
4	非理性世界的精神复归	(61)
第三章	醉眼中的朦胧	(71)
1	酒中风流与侠骨英姿	(72)
2	狂诞与真趣	(79)
3	朦胧月色下的哲人风范	(88)
4	冲破大梦的醉仙	(97)
第四章	山水逍遥	(109)

1	终南捷径上的游子	(110)
2	仙山傲骨	(121)
3	壮观天地	(132)
4	清境神韵	(142)
余论 自觉者的悲剧与走不出的怪圈		(152)

第一章 时代的宠儿与弃儿

中国历史在盛唐写下了她最辉煌的篇章，同时，也哺育了一代诗坛巨匠——李白。在盛唐时代风云中，李白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罕有的英姿活跃在政治、社会、人生的舞台上，满怀激情地追求政治理想，毫无顾忌地坦露其人生态度，痛快淋漓地抒发其失意苦闷，大胆热烈地呼唤自由与超脱。他唱得天真，想得奇特，活得潇洒，骂得痛快。他如同一团火焰。一阵狂风，一片白云，使人觉得他激情澎湃，豪迈狂放，洒脱飘逸，充满了某种神秘感。他用自己生花的妙笔，描绘了一幅幅奇丽壮美的历史画卷，展示了时代的风采，塑造了一个个性奇特的伟大人格。他的豪爽与雄放，无不使人感受到盛唐文化的博大和深厚。然而，李白与盛唐文化的关系却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化心理、精神境界、个性气质，有时明显地表现出与时代背景的不协调。就是说，他在许多方面又超出了盛唐文化的氛围，具有很多强烈的超时代因素。因此，在他的思想感情中，始终蕴藏着一种巨大的苦闷与悲愤，给人们留下许多难解之谜。那么，李白究竟是时代的宠儿还是弃儿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弄清盛唐时代的文化气氛以及人们社会心理的转变，以便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李白与时代的关系。

1 科举时风下的人格独立

唐承隋制，以科举取士，这是唐代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它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势力独霸政坛的局面，彻底铲平了士族和庶族之间存在的鸿沟，给广大寒门庶族提供了入仕的合法机会。特别是以试诗赋为主的进士科，更是给广大文人铺平了一条通往高官要职的道路。在武则天和唐玄宗所任用的科举出身的宰相中，绝大部分是庶族地主，有的甚至是平民。门阀政治时期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已基本消除了。

李白所生活的唐玄宗开、天时期，科举制度已经完全成熟。考试课目、取士原则、应试时间也日臻完善，整个时代形成了一种浓厚的以科举入仕的社会风气。唐沈既济云：

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通典》卷十五引

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盛唐文人的政治观念、社会态度、参政意识、功名欲望等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大都以饱满的热情走向生活，迎接政治的选择，以图建功立业，名扬天下。南北朝文人那种在政治重压下所形成的颓废的享乐情绪，消极的混世心理，悲观的人生态度，在盛唐文人中很难找到。与南北朝文人相比，盛唐文人真像是一代解脱了镣铐的勇士。他们以一种高昂的姿态、积极的精神，带着高度的自信和执

着，活跃在政治和人生舞台上，汇成了一部气势雄浑、自然深厚的生命大合唱。

李白是盛唐文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虽然与盛唐时代气氛基本相符，但他却没有象多数文人那样为科举而兴奋。尽管科举在盛唐那样振奋人心，而且李白又具有超群的文才，但他却始终没有走进科场。这一反常的举动颇令人费解。有人说当时考试形式繁琐，且取士之权由权门把持，李白根本考不上；大多数人则认为，李白选择的是由隐入仕的道路，因而不屑于走进科场。前一种说法是片面的，未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唐玄宗时代，科举制度虽然为权门贵族所利用，但还不至于考不上。当时不少诗人如王昌龄、常建、祖咏等均考中了进士，而单说李白考不中是没有根据的。后一种说法看到了问题的结果，却没有解释问题的原因。尽管盛唐隐逸之风盛行，但在多数人看来，隐逸与科举并不矛盾，如孟浩然、吴筠、卢藏用等以隐著称者也都曾应举。可见，走隐逸之途并不排除走入科场，因而简单地以隐逸来解释李白不应科举的原因，证据仍嫌不足。

那么李白到底为什么不入科场呢？我们说，根本原因在于他自身的文化心理与科举制度的严重不协调。文化心理是一种由特定的知识教育、政治启蒙、社会诱导、文化气氛等因素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它不仅影响人们的个性和气质，而且还作用于人们的参政意识、社会态度和价值取向，是一种相当复杂、相当深刻的心理结构。李白文化心理的独特性，正来自于他青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和启蒙教育，来自于由此产生的入世态度和人格追求。

李白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

附近),大约五岁时随父亲李客迁回内地,定居绵州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县)。李白是否为胡族,目前尚难断定,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李白的父亲是位商人。李白既不出生于中原,也不生长在儒学之家,而且他所生活的区域当时仍是“受汉化甚浅薄”的地区。^①

这一切都决定了李白生活的文化氛围与中原文化是有所不同的。李白最初的文化教育,也不是从儒家经学开始的。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他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可见,李白早期所接受的教育十分博杂,诸子百家,黄老学说,阴阳五行,天文地理几乎无不涉猎,而儒学经典并非其必读之物。所以,少年李白的心中所构画的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世界,而是一片广阔无垠的自由天地。当他走出家园,面向社会,寻求政治启蒙之时,又遇上了一位对他一生影响十分深远的学者——赵蕤。赵蕤字太宾,梓州盐亭县人,隐居于郪(今四川三台县)长平山安昌岩,李白称他为东岩子。这是一位奇人。他虽尊孔子为师,但他所持政治态度却与儒家明显不同。史载他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却不应辟召。他将自己所著之书名为《儒门经济长短经》,但所录皆诸子及史传著作,尤以《老子》、《文子》、《傅子》、《六韬》等书为多,儒家的言论多采《荀子》,于孔孟之说几乎未录。所以,清纪昀以为此书并不属儒门,“皆谈王伯(霸)经权之要,”“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② 总之,他是一位以儒门为表,以黄老为心,

①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5页,三联书店1965年版。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七,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一版。

以纵横家为骨，以隐士为形的奇人高士。李白年青时与他交往甚密，感情甚笃。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道：“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覩，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李白在与东岩子赵蕤如此亲密的交往中，是不可能不接受赵蕤政治思想的影响的。从李白的成长道路来看，赵蕤无疑是他最早的政治启蒙师。

关于李白早期的思想，现已无法系统地了解。但有一点却可以断定：青年李白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政治熏陶，绝对不是纯正的儒学传统。他接受的是一种以黄老思想为依托、以纵横家思想为主体、兼熔诸家思想为一炉的复杂的政治思想。正如赵蕤自称为儒门之士一样，李白报也终将儒家的功名意识作为自己立身之准，而在如何获取功名方面，他却仍然停留在战国游士，特别是纵横家的心理层次上。

战国时期，天下动乱，群雄争逐，各种人才脱颖而出。那些胸怀王霸谋略的纵横家作为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之外的力量，各怀异才，游说四方，具有很强的政治鼓动性，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当时即有“用之则兴，失之则亡”之说。同时，纵横家对自己充满了高度的自信和自负，在精神上与君王处于平等的地位，与君王同榻而坐，抵掌而谈，不知我为何人，君为何人。他们胸怀天下，志向高远，向往一登宰辅之位，遽成王霸之业，却又视功名如草芥，超逸洒脱。他们不愿意屈己于卑位，为一些碌碌琐事所困扰，而是视天下为囊中之物，性情傲岸。在战国时期，纵横家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他们身负王佐之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却又不专属于某一政治集团。从中国知识阶层与皇权的关系来看，这是古代

知识阶层最自由的一个时期。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相对映，知识阶层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也基本摆脱了皇权的专制，政治选择和社会生活都相对自由，“楚才晋用”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不仅不为人们所唾弃，广大士人反倒还因为这种自由而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概而言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个性意识极为强烈的人，他们追求一种平等自由的政治地位，在拯救天下的宏伟大业中实现自我。

李白的个性意识也是如此。他曾不无自负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政治理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①显然，他所构想的社会背景并不是唐朝。唐王朝经过唐太宗和武则天近百年的治理，到唐玄宗时，国力已高度强盛，社会富庶，天下太平，人民生活也相对稳定，可谓“寰区大定，海县清一。”那么李白不是无事可为了吗？不，他在精神上将自己与战国纵横家等同起来，并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中，幻想自己能像他们那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辅佐君王，建树奇勋。他所说的“帝王之术”，也正是赵蕤在《长短经》中所总结的“王霸经权之要”，是纵横家们赖以游说天下的政治谋略。可见，李白的政治起点和文化心理与战国纵横家们基本相似，他也以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面向政治和社会，并希望以一种平等自由的方式来实现自我。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庶族士人政治道路上的障碍，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促成了一种高涨的积极

^① 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见王琦注《李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1版。下引李白诗文均据此，只注篇名。

进取的政治气氛，它较门阀政治是一个巨大进步。然而，科举制度的完善，却是以知识分子的人格自由为代价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知识阶层的政治选择，使知识阶层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完全与统治集团合流，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战国时期的士可以给君王以“得之则兴，失之则亡”的危机感。魏晋时期的名士可以用他们的清淡品藻人物，干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其独立的价值。而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这种相对独立也不复存在了。通过科举，统治阶级不仅给广大士人规定了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用那些书，而且还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困集在科场中，终其一生地苦读应试，皓首穷经。尽管太宗皇帝曾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可他哪里能品味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一感叹中的苦涩和悲辛呢？科举的结果是将知识分子挤压在以儒学经典为立身之本的狭窄胡同中消耗其精力，考中者如登龙门，拟迹庙堂，位极人臣；落榜者泪洒青衫，贫穷潦倒，一无所就。所以有人认为：“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一方面是政治地位的法律确认与社会参与机会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地位的实质下降与社会参与能力的萎缩。”^①

接受传统儒学教育较浅的李白对科举制度的这种专制效应自然相当反感，对科举也不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他有意将自己与儒生区别开来，高扬一种不读经书而建树奇勋的独立人格。在李白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李白对科举制度的不满情绪，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 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历史研究》1989年第14期。。

第一,崇尚侠义,鄙夷诵经。科举是将天下的知识分子熔铸在一个模子里,以儒学经济为出身入仕的唯一正途。先秦和魏晋时期的文人们所具有的种种独特个性在科场中几乎都已磨光了,正如五代王保定所言:“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单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文场者,亦无所恨。”^①对这种现象,李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游侠精神批评这些皓首穷经的儒生的平庸:“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②“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③在这种对比中,游侠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侠义勇武,而且还在于他那种不拘于世俗的自由精神。在李白看来,人生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充分地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才能。那些死守书阁、咬文嚼字的文弱儒生能成就什么呢?有什么价值呢?李白是绝对不会走进“赚得英雄尽白头”那一条死胡同的。

第二,提倡务实,反对虚浮。在文坛上,李白是反对六朝浮靡文风的先驱。一曲“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唱出了他借复古以除时弊的心愿。在现实政治中,李白也是注重务实的。就科举而言,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叫人死背经书,不涉时务,结果培养出一批不懂政治而又故作风雅的穷酸儒生。《旧唐书·薛登传》载,登于天授年间上疏陈科举之弊,指出当时文士们“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

① 王保定《唐摭言·散序进士》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1版。

② 《行行且游猎篇》。

③ 《侠客行》。

以浮华为实。”对此，李白深感气愤，曾作诗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其《嘲鲁儒》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诗人把自己放在不达时事的儒生的对立面，认为他们“与我本殊伦”，于中明显地表现出他对科举制度扼杀人才之弊的强烈不满。

第三，标榜独立人格，影射请托之风。科举取士的名额十分有限，赵匡《选举议》中说：“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为求及第，士子们便竞相奔走于公卿权贵之间，以求汲引。于是，社会上请托之风甚行，不少文士甚至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卑屈于权贵脚下，乞求提携。《旧唐书·薛登传》载，当时的举子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又《文献通考·选举考二》说：“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进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可见，科举固然给广知识分子带来了入仕的合法机会，但同时又剥夺了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使他们不仅成了屈从于政治的附庸，而且蜕变为权贵的哈巴狗。有识之士无不对此深感痛心。大诗人杜甫以写实的笔法，充满悲怨地描述了他求仕的艰辛：“骑驴三十载，旅食京

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①而李白却没有如此多的悲怨。他以战国纵横家的高傲姿态走向政治，寻觅人生。他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②他所秉承的是“不屈己，不干人”的人生原则。他虽然也曾有过干谒之举，但从未做过有损自己尊严的事。他以战国纵横家为生活楷模，从不把自己放在王公贵戚之下。在他的心目中，“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③在现实人生中，他从不表现出一点点奴颜媚骨。他认为，尽管自己出身卑下，但在人格上却无高下之分，对公侯如此，对帝王也是如此。李白为什么以姜太公、诸葛亮、谢安作为自己的政治楷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政治家与他们所属的君王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相互作用，完全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与李白的傲岸人格正好相符。正因为李白身上有一副蔑视权贵的铮铮傲骨，所以，面对科场上权贵当道的现实，他既不可能象寻常举子那样跪拜求助，也不可能象杜甫那样悲苦哀吟，而只能以崇高的自我人格相标榜，以自负和自傲作为自卫的武器。因此，李白作品中所洋溢的那种傲视权贵的思想，其实也就是替那些软骨的举子们向王公贵戚们投去了复仇之剑。

上述三方面深刻地表现了李白的个性意识与科举政治的极度不协调，这也正是李白不入科场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所带来的文化束缚、心理变态和人格沦丧是唐以后千百年来

①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下引杜诗均据此。

② 《与朝荆州书》。

③ 《少年行》。